

汉代凉州的全景图像

——《凉州通史》西汉卷、东汉卷评介

□ 薛小林

2025年11月,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魏迎春教授主编的十卷本《凉州通史》出版后,受到学界普遍关注,该书与2023年出版的《敦煌通史》共同构成河西走廊历史书写的“双壁”。较之后者,《凉州通史》在篇幅与分卷上有较大的拓展,汉代部分细分为《西汉卷》与《东汉卷》,体现了编写团队在历史视野和学术能力上的突破。笔者就其内容特点与学术价值予以评介,供读者参考。

谋篇布局宏阔缜密

《西汉卷》由郑炳林教授与司豪强博士合著,全书考证了秦汉初的武威历史、武威的经济社会发展、武威在汉匈关系中的战略作用及新莽时期对武威的治理等一系列历史问题。《东汉卷》由魏迎春教授与陈晶晶博士合著,重点考述了两汉之际凉州刺史治所变化、东汉前期武威的治理发展与对外交往地位提升、汉羌战争中武威军事地位的凸显、东汉武威郡属县位置及其变迁等问题。两卷的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河西地区在汉代的政治军事地位异同和变化,并在撰写中得以清晰呈现与深入探讨。

在内容的结构布局上,两卷皆以时间为纲,重视探讨武威的政治军事发展脉络,同时又兼顾横向的社会治理、经济生产、对外交流、地理交通等多方面专题研究,使得内容既丰富又条理清晰。如《西汉卷》考述了秦汉之交到新莽时期的武威社会历史发展,并“交错”式地设置了政治、外交、军事、交通、人口、文教等多个主题,多元立体地呈现了区域历史的特征。《东汉卷》则更侧重政治军事史的研究,同时也对武威地区的民族与文化作了精当研究。此外《东汉卷》在末章着力研究军事变革史,专题考证了武威的历史地理变迁,又在附录部分对武威旱滩律令简、武威《礼仪》作了补充研究。

两卷在内容结构上均体现了明显的详略有别。如《西汉卷》着重研究资料较为丰富的武帝前后、新莽时期的政治与对外交流史,对西汉晚期的武威政治军事着墨较少。同样,《东汉卷》对建武前期武威政治史作了大量详细考论,对东汉中期的汉羌战争研究也较为深入,对东汉晚期的武威研究则以点及面,查缺补漏。两卷着力于学术创新,对学界以往的观点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有所辨析与修正,展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与卓越的学术能力。

《西汉卷》《东汉卷》延续了郑炳林团队政治史研究传统优势,对汉代武威的政治军事史作了深入研究。尤其在新莽经略武威与西域、建武之初凉州政治格局变动、汉羌战争与武威军政中心化等问题上,作者旁征博引,细致分析,使得读者能以武威之治理而见两汉经略凉州之全景,为《凉州通史》博大的政治史研究视野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史研究层面,《西汉卷》开篇便将武威历史研究的目光前瞻至秦汉之交,把中原王朝和匈奴等民族对武威的开拓、争夺、经营历程置于河西开发史的大视野中。而对新莽时期武威历史的研究,则立足于具体的行政改革

《西汉卷》《东汉卷》对武威历史地理的研究,尤其是深刻细致的考证更见作者功力,相较而言,《西汉卷》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方面的考证着力甚足,《东汉卷》则在政区地理方面研究深入。

《西汉卷》开篇便对西汉前期月氏控制河西的范畴、汉匈争夺河西的概念变化进行了考证,还原了武威建郡的军政背景,为解决河西四郡初置时间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章对武威边塞的建立和拓展过程作了考述,结合实地考察和考古遗迹,描绘出令居塞—揳次—

《西汉卷》《东汉卷》对两汉武威的社会史研究成果突出,从内容上基本分为经济史研究、人口社会研究和科技文化研究,这一系列研究尤其在《西汉卷》中得到了点面结合的集中展现。

《西汉卷》既搜寻了河西汉简对武威经济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直接记载,又从农业生产、商贸贸易、货币流通等方面,多元立体地论证了河西经济的共性特征。另外,本卷对西汉武威人口问题作了开创性考察,尤其对于西汉时期武威与河西地区的徙民戍卒、丹阳楚人、故吏群体等多种身份人群进行了举例研究,极大

政治史研究的广阔视野

细节和西域征战史实,主要对新莽改制中武威改名张掖的时间和因果作了深入研究,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考据能力。《东汉卷》重点考述了两汉之交至东汉前期的凉州政治变迁和武威行政变革,开创性地提出了凉州中心河西说和治所变动说,将凉州与武威的直接联系向前延伸了数百年。对于东汉末年“雍凉之变”的研究,则清晰梳理了兴平至建安中期武威成为雍州治所的历程和政治因素。以上研究把凉州史与武威史的研究真正结合起来,实现了“总括凉州,达于武威”的研究目的。

两卷的军事史研究充分反映出汉代凉州与武威的极大贡献和军事地位。如《西汉卷》

史地研究的重大推进

深入探究。《东汉卷》对武威郡辖境扩展后的相关县、城位置作了重新考证。如对姑臧县城的位置及迁徙问题,本卷结合武威城区发现的汉代墓葬,以及《水经注》《西河旧事》记载的异同,认为今武威有大量东汉墓葬存在,因此东汉在此建成姑臧新城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一论点对于解决汉代姑臧位置的“锁阳城说”和“武威古城说”的长久争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卷又结合《续汉书·郡国志》所载“左骑千人官”与雷台墓马俑铭文“守左骑千人张掖长”,考察“左”为方位而非副

社会史研究的新突破

充实了西汉武威人口社会研究的内容。《东汉卷》通过分析《后汉书》《孔丛子》等文献记载,认为武威郡在更始至建武前期接收了大量的流民或客户。可见两卷对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各有所长,前者侧重利用出土新文献,后者则善于考察传世文献的“侧面”,这两种文献研究法也是《凉州通史》书写中一以贯之的“密钥”。

《西汉卷》《东汉卷》对汉代武威的文化教育、科技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较大突破。如《西汉卷》认为“武威郡所设学官,是西汉中原郡国学校制度向河西新地推广的结果。而学官的



凉州攻鼓子



凉州夜色美



凉州贤孝表演

职,左骑千人城址当在凉州区长城镇的岸门古城。另本卷基于《三国志》《十六国春秋》等描述,考证出汉晋显美县城当在今永昌县水源镇北的沙城古城,其处于《悬泉里程简》所言仓松一鸾鸟一小张掖一姑臧的南北支线上。又结合唐以来方志记载,认为今靖远县城便是两汉祖厉县城处。以上研究以新的视角解读已有文献,并结合考古材料作了全新探究,为汉代西北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新见,开拓了新的视野。

一经验推至全国治理之上。”两卷对于文化科教史的研究,体现了《凉州通史》对出土文献应用的纯熟手法,从简牍文献的只言片语中发现新的论点,这一“集腋成裘”的研究方式,是历史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总之,《西汉卷》《东汉卷》突出展示了两汉武威社会历史发展的全景图像,是秦汉史研究和西北史地研究的代表性新成果,体现了《凉州通史》这一丛书的深厚文化积淀和卓越的学术质量,为凉州文化研究及河西区域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凉州通史》之《西汉卷》《东汉卷》,郑炳林、魏迎春等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配图均为刘忠摄)

挖掘凉州文化的时代价值

□ 张国才

凉州文化的魅力,源于其海纳百川、多元融合的形成过程。它是在长期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复合型文化。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与商贸重镇,凉州曾是东西方货物汇聚流通的重要枢纽。西域的农作物,如胡麻、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多在凉州率先种植并传入内地。被汉武帝誉为“天马”的大宛马、乌孙马及各种珍稀毛皮制品,也经由凉州输入中原。同时,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如铁铤、铁锄等农具以及掘井技术、冶铁技术等,

也通过武威向西传播,有力地促进了科技的交流与进步。

十六国时期,大量中原士人西迁,凉州成为保存与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基地。北魏平定北凉后,将凉州三万余户士人、工匠、吏民迁至平城,使得保留在凉州的典章制度、学术思想、工艺技术传入北魏腹地,为后续孝文帝的改革奠定坚实的人才与制度基础,并深刻影响了隋唐制度的演变。

从史前时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沙井文化,到两汉时期的屯垦戍边文化与天马文

化,再到魏晋时期的五凉文化、石窟文化,乃至隋唐时期的边塞诗文化与乐舞文化等,凉州文化序列完整,脉络清晰,特色鲜明。

历史上的凉州,堪称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宏大剧场。自先秦以来,乌孙、月氏、匈奴、氐、羌等古代民族先后在此繁衍生息,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吸纳彼此的文化精华,推动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隋唐时期,吐谷浑、粟特、吐蕃等民族活跃于河西地区,武威发现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出土的精美丝织品、白葡萄酒、金银玉器等珍贵文物,实证了当时各民族

间广泛而深入的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西夏文字、西夏碑更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创造性成果。明清时期,凉州地区文风鼎盛,出现“右文之盛,前古罕闻”的文化繁荣景象,为我们今天深刻理解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刻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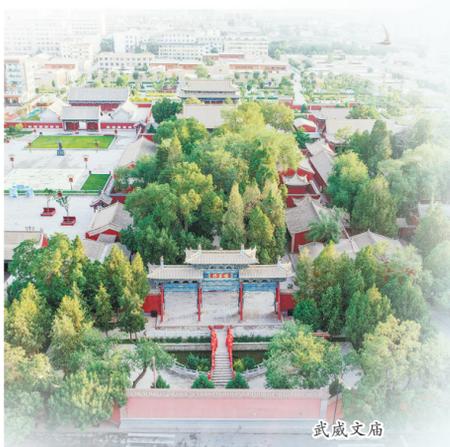
在精神文化层面,西域的音乐、舞蹈、乐器等艺术形式纷纷传入,并与河西本土的音乐元素相互融合,催生了独具特色的《凉州乐》等艺术瑰宝。由此可见,凉州文化自发之初,就不断吸纳来自古代印度、希腊、波斯以及中

地区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从而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与融合性。

进入新时代,凉州文化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等方面,依然呈现出巨大的潜力和价值。时代发展也为凉州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生产生活实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政策保障。深入挖掘凉州文化的深厚内涵,积极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多元平台,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员)

· 读书 ·



武威文庙



武威新貌 资料图